

# 新中国 70 年国家治理体系 变迁的逻辑及前景

徐法寅

---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经历了前后相继、创新发展的三大阶段:国家总体控制阶段、国家放权改革阶段、特色制度整合阶段。这种变革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是政治领导核心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把握客观要求、转变治理理念的行动结果。当前,我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国家治理体系变革仍需要坚持“特色制度整合”的原则,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调动、规范和统合国家、市场和社会力量,以有效应对社会经济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 治理 国家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

DOI:10.16091/j.cnki.cn32-1308/c.2019.06.004

---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其后推出了一系列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理念、制度、政策和措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已有研究表明,我国的发展道路是“历史连续性而不是断裂性的”<sup>①</sup>。因此,理解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理念、实践、经验、路径和前景,需要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独特历史逻辑进行考察。

经验分析表明,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发展经历了前后相继、创新发展的三大阶段:国家总体控制阶段(1949-1978)、国家放权改革阶段(1978-2012)、特色制度整合阶段(2012- )。这种变革既是社会经济发展在不同

阶段上的客观要求,也是以民族和人民利益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地把握客观要求、转变治理理念的行动结果。今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仍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特色制度整合”的原则,通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调动和规范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积极引领和有效应对社会经济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

## 国家治理体系及其经验分析框架

更好地把握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特殊性和历史性,需要将“国家治理体系”视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并经验性地分析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效果及其社会历史逻辑。

### (一) 国家治理体系的概念

从外部结构形式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市场和社会等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西瑙认为,治理是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这种活动不仅包括政府机构,而且包括非正式的、非政府机制,甚

至存在没有政府的治理<sup>②</sup>。治理强调多种行动者或群体的相互影响,不能简化为任何单一行动者或某个群体<sup>③</sup>。国内学者也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中多种行动者的协同和互动<sup>④</sup>。

虽然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体系本身是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功能目标导向。在分析性的功能界定中,治理被定义为实现国家安全和稳定、有效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通过参与和负责达成合法性等公共职能的规则、制度和过程<sup>⑤</sup>。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可以界定为: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协调社会组织方式和统合社会资源的制度和过程。调动和统合社会资源的方式包括国家强制、市场交换、自愿服务、自治互助等四种类型。国家治理体系涉及的社会组织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四类:国家组织、市场组织、公益组织和自治组织。在这四种社会组织中,社会成员的组织方式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是不同的(表 1)。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治理所描述的现象是多种制度、组织和领域的相互关系<sup>⑥</sup>。

表 1 国家治理体系涉及的参与力量

| 组织与环境的关系 | 内部的组织化程度 |      |
|----------|----------|------|
|          | 较高       | 较低   |
| 公益性      | 国家组织     | 公益组织 |
| 私利性      | 市场组织     | 互益组织 |

(二) 国家治理体系分析: 从规范研究到经验研究

在西方治理理论的影响下,当前关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大部分研究是强调外在结构形式的规范研究,这种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已陷入了脱离实践的西方主义困境。事实上,在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下发展出来的治理理论,深受极端自由主义的影响,强调市场本位,反对政府的干预,主张有限政府<sup>⑦</sup>。因此,在西方社会产生的“治理”理念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的翻版,也是在西方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产生的<sup>⑧</sup>。为了克服规范研究的不足,经验研究将国家治理体系视为一个描述性概念,即视为现实中存在的一类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具有不同的存在方式<sup>⑨</sup>。但是,这些研究仍未深入分析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逻辑和实际效果。

此外,经验研究也需要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在

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实际效果。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治理结构的好坏,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看不同条件下治理的有效性<sup>⑩</sup>。经验研究要对国家治理体系及其变革进行社会历史分析<sup>⑪</sup>。具体而言,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历史分析主要包括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逻辑和社会行动的主观应对逻辑。前者主要是指社会经济现状和挑战,在客观上要求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和适应。后者主要是政治组织需要把握社会经济机遇和挑战,从而积极主动地变革国家治理体系(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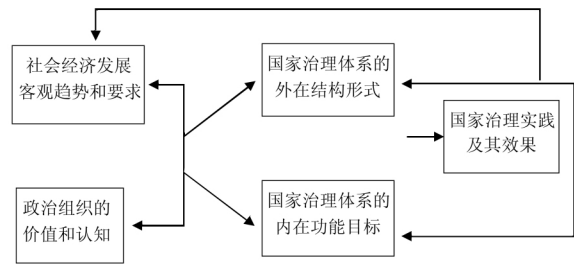


图 1 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历史分析

新中国 70 年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

(一) 国家总体控制的治理体系: 1949 - 1978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这一时期,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总体特征是国家对社会总体控制的加强。通过国有化和集体化,市场组织被改造和重组为行政化的公共功能单位,实现了国家对物质生产和分配的集中控制。1958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经济组织几乎实现了百分之百的公有化;在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传统家庭经营也完成了向集体经济组织的转型<sup>⑫</sup>。

民间自治组织和公益组织也通过取缔、改造和收编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在城镇,基层政权总体上实行了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组成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但因经费完全出自国库,这些自治组织具有了政权组织的性质<sup>⑬</sup>。在农村,1958 年农村基层政权改造为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农村各级集体也通过公社成为国家控制的“单位”<sup>⑭</sup>。国家重建的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国家对社会实行总体控制的辅助力量<sup>⑮</sup>。

政党组织与行政系统强化了国家组织的监控

和动员能力,为国家总体控制提供了组织基础<sup>①6</sup>。在党政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直是我国国家组织的基本原则。195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直接领导国家五大口的工作。国家纵向组织机构和制度强化了一元化的政治体制。1957年7月,毛泽东印发《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要求“在不违背中央政策法规的条件下,地方政法文教部门受命于省市、自治区党委和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sup>①7</sup>。

### (二) 国家放权改革: 1978 - 2012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期间,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其基本特征是国家进行了渐进性放权改革,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加速发展。首先,创新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转变政府职能。在党的执政理念方面,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其后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略,强调科学发展<sup>①8</sup>。在党的领导方式上,改变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局面,建立了党政分工、各司其职的格局<sup>①9</sup>。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的政府改革主要集中在政府规模和机构数量上的调整,那么改革开放后的改革是围绕政府职能转变进行的,核心特征是从管制型政府向监管型、服务型政府转变<sup>②0</sup>。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调动和配置资源中的作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形成的人民公社体制,逐步转变为以农村家庭为单位的市场化经济体制;农民家庭获得了土地使用权、生产经营权、劳动力配置权、经营收益权,农村家庭成为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sup>②1</sup>。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城镇国有企业进行了市场化改革;20世纪90年代,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产权改革中,大批中小型国有企业转制为非公有制企业,并形成了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两种国有企业形式<sup>②2</sup>。此外,党和国家恢复、鼓励、引导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断赋予非公有制市场主体更多的制度空间和社会资源<sup>②3</sup>。

恢复和发展社会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国家通过单位、街居、人民公社进行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体制,要求更多的社会组织承担起社会管理和服务

的功能<sup>②4</sup>。《社会团体登记条例》《基金管理办法》和《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的出台,标志着到1989年我国社会组织政策最终走向了全面恢复发展。此外,1987年和1989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奠定了群众自治制度的法律基础,群众自治组织得以恢复发展,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依托<sup>②5</sup>。

### (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特色制度整合”为特征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四个自信”,开启了以完善和发展特色制度来整合社会力量和资源的国家治理体系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主要是通过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4年2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sup>②6</sup>。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也成为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走出了单纯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性模式,强调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从治理目标上来说,“中国梦”的提出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细化,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设定了总体指向。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价值目标和根本动力<sup>②7</sup>。“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则将“中国梦”具体化为实践的目标<sup>②8</sup>。从治理内容上来说,“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国家治理体系变革提出了总体要求。从治理制度上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加明确,“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并提出要“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sup>29)</sup>。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提出及相关制度的出台,体现了整合市场力量和国家力量的努力。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国家力量和市场力量都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途径。但是,国家和市场相互关系的体制机制不完善导致了一些妨碍社会公共利益实现的“市场失灵”和“监管失灵”问题,即市场组织为了盈利而不顾甚至破坏社会公共利益,国家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为了私利而滥用权力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sup>30)</sup>。2016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时,第一次用“亲”和“清”两个字精辟概括并系统阐述了新型政商关系<sup>31)</sup>。十九大报告又强调“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sup>32)</sup>。

从治国理政的角度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发展之路。从理念上来说,党和国家从治国理政的角度对待社会组织,强调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sup>33)</sup>。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发展之路”。就整合社会组织的力量而言,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制度设计最为典型,从2012年开始,中央财政每年安排2亿元专项资金用于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 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社会历史逻辑和前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变革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地把握客观要求、转变治理理念的行动结果。

##### (一) 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社会历史逻辑

###### 1. 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与国家治理体系变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变革表明,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客观背景,为国家治理体系变革提出了客观要求。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国一直在追求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在贫穷落后的背景下,国家组织是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关键性因素。正像亚历山大·格申克隆所说,现代化后发国家拥有先发国家不曾拥有和面临的机遇、条件、压力和挑战,因此也会采取国家主导的工业化道路<sup>34)</sup>。1949年,新中国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的国家总体控制的治理体系,是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构成要素,适应了当时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sup>35)</sup>。国家总体控制的治理体系极大地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了维持社会稳定、恢复国民经济、推进现代化进程的目标<sup>36)</sup>。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采取的宏观经济措施成功地抑制了通货膨胀,恢复了财政平衡,实现了经济复苏。改革开放前,我国建立了一个基本完善的工业和交通体系,在农村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和基本农田建设。

在进一步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国家总体控制的治理体系也凸显了在调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方面激励不足和效率低下的问题。在企业层面上,计划经济强调一致性和协调性,不利于市场竞争和企业自主性;在个体层面上,计划经济对就业和工资进行严格的管理,“搭便车”现象非常严重<sup>37)</sup>。此外,国内外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发展目标和治理体系却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sup>38)</sup>。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形势下,党和国家调整了基本路线,将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完善和加强了党的领导,转变了政府职能,实施了对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放权改革。1978年到2012年的放权改革充分地调动了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造就了“中国奇迹”。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79亿元,到1978年增加到3645亿元,2011年达到了472115亿元;2011年的经济总量比1952年增加了77倍。1978-2011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每年近9.9%的速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8.8%。

经过三十几年的高速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对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我国经济需要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sup>39)</sup>。2000年以来区域之间的相对不平衡虽然有所缓解,但是绝对差距却仍在拉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不断

扩大的趋势,城乡收入比从1985年的2.10上升至2013年的3.03<sup>⑩</sup>。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劳资矛盾、政府行为引发的官民矛盾等社会矛盾也趋于紧张。这些现象和问题涉及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客观上要求进一步调整国家治理体系,统合各种力量和资源<sup>⑪</sup>。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 2. 政治领导核心的作用和国家治理体系变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表明,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诉求和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工作方法是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要求、转变国家治理理念、变革国家治理体系的主观基础。

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变革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遵循和动力。毛泽东同志早在1934年就指出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sup>⑫</sup>。中共七大第一次明确地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写进党的总纲。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同志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首次与记者见面就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sup>⑬</sup>。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要求“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但是,“人民利益”的内涵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sup>⑭</sup>。建国初期,反革命势力仍然存在,同时也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因此毛泽东同志在1950年4月指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sup>⑮</sup>。其后,我国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仍然没有解决,中国共产党于1953年提出了过渡时期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党的八大又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sup>⑯</sup>。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重要论断,并提出了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 (二)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及其社会历史逻辑表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仍然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特色制度整合”的思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刻把握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积极响应人民的利益和需求,充分调动、规范和整合国家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以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首先,坚持和强化党的领导。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需求有了显著提高,绿色消费理念不断加强,文化消费日益繁荣。正是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对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为国家治理体系变革明确了价值导向,也为认识和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挑战提供了认知基础<sup>⑰</sup>。

其次,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通过制度改革来调动和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取得的。当前,我国已进入了劳动力成本提高、人口红利消失的新阶段;投资驱动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此外,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等问题成为社会矛盾产生的潜在根源;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存在很多短板。这都要求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三,牢牢把握“特色制度”这个实践原则。新中国初期,国家治理体系的重构虽然借鉴了苏联模式,但仍然是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国情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sup>⑱</sup>。在市场转型时期,我国也没有采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而是按照中国国情实行了渐进性改革,逐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sup>⑲</sup>。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

下,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仍然需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统合各种社会力量和资源。正像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sup>⑤</sup>。

第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动、统合和规范市场力量。充分地调动和统合市场力量,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以公平公正为导向,消除市场歧视行为,强化落实减少社会资本市场准入限制、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公平待遇等措施。二是进一步调整政府和市场的相互关系,为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发挥作用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落实简化行政审批,推进政府服务标准化进程。三是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工人福利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加强立法和执法力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第五,鼓励社会组织发展和规范社会组织活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从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来看,国家、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不同价值导向和思维逻辑造成的制度模糊性,成为制约社会组织发展和功能发挥的主要因素<sup>⑥</sup>。今后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必须从根本上明确社会组织的功能定位,加快《社会组织法》的制定,对社会组织的价值导向、根本原则、基本功能、工作领域、内部治理等进行明确规定,解除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后顾之忧,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在此基础上,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完善和扩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和范围。

①徐勇《历史延续性视角下的中国道路》,《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②J. N. Rosenau, “Governance,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

itics”, in J. N. Rosenau and E - O Czempiel ( eds) ,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 - 6.

③J. Kooiman, “Findings Specul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in J. Kooiman ( ed) , *Modern Governance* , London: Sage , 1993 , p. 258.

④何增科《理解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廉洁政治与国家治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5-6页;胡宁生《国家治理现代化:政府、市场和社会新型协同互动》,《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⑤Brinkerhoff, D. W. , “State Fragility and Governance: Conflict Mitigation and Subnational Perspective”,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11, 29( 2) : 131 - 153.

⑥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9年第1期。

⑦李风华《治理理论:渊源、精神及其实用性》,《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5期。

⑧R. A. W. Rhodes, “The New Governance: 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 *Political Studies* , 1996, XLIV: 652 - 667, p. 656;申剑、白庆华《治理理论及其评价》,《广西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⑨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郭明、蒋红军《从“建构主权国家”到“优化治理体系”》,《理论月刊》2018年第7期。

⑩R. A. W. Rhodes, “The New Governance: 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 *Political Studies* , 1996, XLIV: 652 - 667, p. 653.

⑪徐勇《治理转型与竞争—合作主义》,《开放时代》2001年第7期;陈玉生、张开云《“创新”逻辑下的中国国家治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3期。

⑫Jonathan Ung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 , Armonk, NY: M. E. Sharpe, Inc, 2002.

⑬陈辉《新中国成立60年来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与变迁》,《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1期。

⑭徐勇《政权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尤琳、陈世伟《国家治理能力视角下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6期。

⑮马福云《人民团体参与社会治理初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何国祥《全国性群团的性质、组织及其会员制的比较研究》,《学会》2005年第8期。

⑯纪程《“国家政权建设”与中国乡村政治变迁》,《河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黄利新《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城区基层政权建设》,《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

⑰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56-465页。

- ⑮田绪明、吴家庆《改革开放40年来党的发展理念的历史变迁及其现实启示》，《湖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 ⑯魏新文《新时期党的领导方式转变的表现形式及内在逻辑》，《求实》2009年第7期。
- ⑰马英娟、李德旺《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践历程与未来方向》，《浙江学刊》2019年第3期；何颖《中国政府机构改革30年回顾与反思》，《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12期；李景鹏《恢复与反思：政府机构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中国行政管理》2005年第2期。
- ⑱张厚义、刘文璞《中国的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110-120页；李文《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和前瞻》，《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2期。
- ⑳黄少安《国有企业改革40年：阶段演化、理论总结与未来思考》，《江海学刊》2018年第5期；洪功翔《国有企业改革40年：成就、经验与展望》，《理论探索》2018年第6期。
- ㉑白永秀、任保平、吴振磊《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30年：回顾与展望》，《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
- ㉒卢汉龙《发展社区与发展民主：我国基层社会的组织重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胡荣《市场经济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探索》1994年第4期。
- ㉓林尚立《基层群众自治：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4期。
- ㉔《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
- ㉕韩喜平、巩瑞波《中国梦：现代化的中国智慧与中国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2期。
- ㉖朱炳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在逻辑》，《红旗文稿》2018年第5期。
- ㉗《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9年11月1日。
- ㉘鲍金红、胡璇《我国现阶段的市场失灵及其政府干预的关系研究》，《学术界》2013年第7期；王彩霞《政府监管失灵、公众预期调整与低信任陷阱——基于乳品行业质量监管的实证分析》，《宏观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
- ㉙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6年3月9日。
- ㉚④⑧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 ㉛郁建兴、沈永东《调适性合作：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策略性变革》，《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3期。
- ㉜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62, pp. 5-30.
- ㉝谢立中《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导论》，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24页。
- ㉞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7页。
- ㉟武力《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道德预设和“阶级斗争”——从道德层面对1978年以前中国经济运行的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郑绍庆《坚定地走市场化改革之路——从人性伦理角度再论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生产力研究》2008年第6期。
- ㊱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 (eds),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7.
- ㊲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雷米·卡拉斯《中国向高收入国家国家转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因应之道》载林重庚、迈克尔·斯宾塞编《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470-501页。
- ㊳吕伟、杨沫、王岩《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教育不平等与政府教育投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3期。
- ㊴何艳玲《“回归社会”：中国社会建设与国家治理结构调适》，《开放时代》2013年第3期。
- ㊵《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8-139页。
- 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0页。
- ㊷肖贵清《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年第11期；王淑玲《中国共产党宗旨的历史特征》，《史学月刊》1992年第5期。
- ㊸《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4页。
- 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文献汇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41页。
- ㊺陆灿芬《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依据、意义及要求》，《学习与实践》2018年第2期。
- ㊻吴国衡《当代中国体制改革史》，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 ㊼李绍荣、程磊《渐进式与休克疗法改革的比较分析》，《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 ㊽《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9年11月1日。
- ㊾吴磊、余祖成《多重逻辑、回应式困境与政策变迁——以中国社会组织政策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作者简介：徐法寅，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732

（责任编辑：毕素华）